

中国古代名案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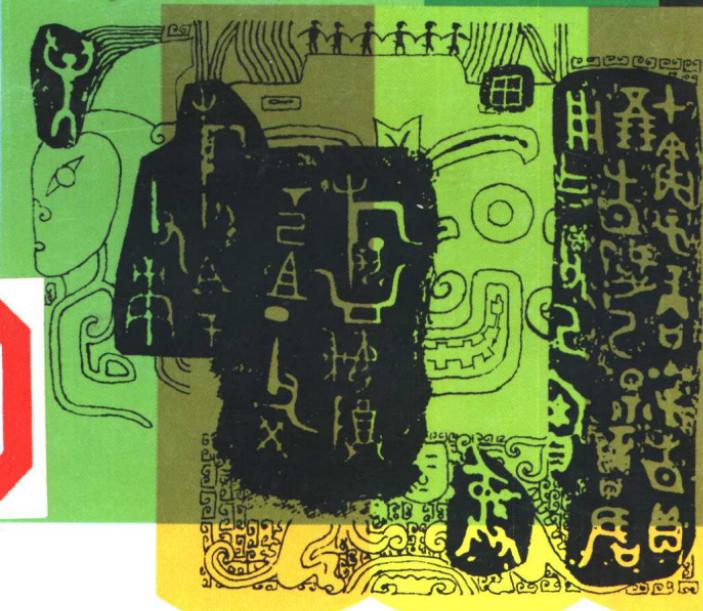
仓颉有灵当长恨，他
发明了汉字，后人却用
它制造冤情。苦坏了天下
多少读书人？

仓颉恨

杜景华 董家骥 朱洪海 编著

中国古代名案传奇

CANGJIEH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仓颉恨/杜景华等编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8
(中国古代名案传奇)
ISBN 7-205-03923-1

I . 仓… II . 杜… III .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3649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77 千字 印张: 8 $\frac{3}{4}$

印数: 1—6,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责任校对: 姚飞天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9.0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名案，世代流传，是中国民众的不朽话题。在传承中，其情节逐渐艺术化，案中人物逐渐典型化，进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一大主题。反映中国古代名案的戏曲、电影、话本小说等，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人民大众百看不厌，这不仅是因为案情本身曲折动人，更主要的是它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公平和正义的愿望，体现了人民同情被压迫者、憎恶压迫者的情感，凝结了人民大众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胆识和智慧。为了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我们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以飨读者。

目 录

乌台诗案 (1)

苏轼英才盖世，想必也倚才傲物，性情耿直，有话就讲，所以才遭人妒恨，并终被奸小所陷，屡遭入狱贬黜之苦。

高启诗案 (33)

放牛娃与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既需要文化，又怕被文化所捉弄。这两种态度截然相反，然而在朱元璋身上又是那样的统一。这可苦了文化人。不接近他，要遭灾；接近他，也难免罹难。

庄廷锐《明史辑略》案 (55)

一部《明史辑略》，生生被定为毒草，牵连数十家，杀害数百口、伤及上千人。行刑那日，编书者庄廷锐坟冢被掘，庄廷锐面色如生。刽子手一刀下去，庄廷锐脑浆喷涌，蹿起数丈，溅到刽子咽喉中，刽子手当场毙命。其时，天空黑气滚滚，太阳无光。

无奈，苍天有眼，而天子无珠。

查嗣庭考题案 (89)

考官查嗣庭之罹难，根本不在他的文章有什

么偏颇，他所出考题有什么弊病。可要收拾你，总该有个说得出去的借口吧？你是文人，就从文字上找你的毛病吧。不怕你没有毛病。正所谓：说你坏你就坏不坏也坏。

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始末 (113)

一批反清的书生们被残酷地杀戮了，他们的精神导师也被“戮尸枭示”了。但是，他们的精神还在，他们精神导师的著作也不会被彻底销毁，总有不怕掉脑袋的人珍藏它。鲁迅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清诗别裁集》案 (147)

君宠不可恃。曾经是乾隆皇帝眼中红人的沈德潜，因所编诗集触怒了皇上，竟在死后被追夺了官衔，取消了祠谥，挖掉了墓碑。如此看来，乾隆之宠爱沈德潜，不过是邀邀风雅而已。

徐述夔《一柱楼诗》案 (161)

徐述夔生前万万想不到，他的两句诗“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会在身后惹出那样的乱子。自己和儿子被剖棺戮尸不说，孙子和弟子更被处斩。如果在天有灵，他定然悔恨交加，辛苦吟诗，却引来杀身之祸。若有来生，他便是引车卖浆，也不会吟诗作文的。

尹嘉诠为父请谥案 (185)

尹嘉诠确是个不识好歹的角色。他想为先父请个谥号，说明他是孝子，龙颜尽管不悦，还是

原谅了他。他该见好就收了。他却不依不饶，一面继续为父亲请谥号，一面清议人物，和皇上叫板。皇上怒不可遏，提笔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有了这样的朱批，区区一个尹嘉诠，还会有好？

程明禋寿文案 (203)

程明禋谨慎一生，不想老来却因受人之托而作的祝寿文被处身死。这显然是冤狱，苍天为之动容。行刑那日，响晴天突然下起空前的大雨，围观杀人的看客们鸟兽般散去。然而，程明禋还是被杀掉了。

方国泰藏匿《涛浣亭》诗集案 (237)

本案中似没有大恶人，乾隆不坏，巡抚不坏，县丞也不坏，便是告发者袁大同，除了有一点嫉妒心外，也不是奸佞小人。然而，安徽生员方国泰却因“藏匿《涛浣亭》诗集案”而几遭不测。谁之过？

乌台诗案

苏轼英才盖世，想必也倚才傲物，性情耿直，有话就讲，所以才遭人妒恨，并终被奸小所陷，屡遭入狱贬黜之苦。

乌台诗案的主人公是宋代文学家苏轼。与其他文字案当事人的区别，是苏轼终于能够苟全性命，这使后人有幸读到了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乌台诗案与后来明清两代的文字案有所不同，后者是一些读书人借酒消愁，或是不满朝政，或是讥讽落后民族，再则是会写字的被善于惹事生非的挑出毛病，闹个满门抄斩。

而整个宋代都对读书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宏，苏轼一案的根本缘由则在于他涉政太深。

当年苏轼进京赶考时，年方二十。主考官欧阳修见到苏轼的卷子，拍案惊奇，立即拿给评判官梅圣俞看，梅圣俞也赞不绝口，两人商量要取此卷为第一名，此时欧阳修

心中一动，再取卷子来看，怎么看怎么像自己学生曾巩的手笔，思之再三，挥笔在卷上写下第二名。直到卷子开封，方知是苏轼。

若干年后，梅圣俞见到苏轼，问起当年圈阅苏轼考卷时百思不得其源的一句古语出自何处，苏轼答曰：是我杜撰。梅圣俞一连惊讶了好几天。

两个月后，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殿试，双双被钦点为进士。

当时的学风，凡是经主考官考取的功名，被考者要尊主考官为恩师，二苏从此出自欧阳修门下。宋朝士大夫尤好喧哗取闹，极小的事情也会引起持不同政见者激烈的争论。赵氏皇帝又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置了御史台和谏院，两个系统如同后来飞机上的引擎，当一个失去功能时，另一个仍旧工作。除此之外，宋朝还提倡任何高级官员都可以对上至宰相，下至九品提出抨击和指责，甚至也包括皇帝。

这为一生都在舞文弄墨的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可以对任何事情表现出自己的观点，于是唐代的牛李党争那样复杂纠缠的人事网络比起此时也要略逊一筹。

苏轼时代，由于王安石的崛起，士大夫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在改革上，从而形成新党与旧党之争，双方都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引得一群士林学儒乱作一团。

欧阳修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反对者，苏轼同样没有摆脱宋王朝士大夫喜欢结党的特点，遂和欧阳修站在同一个战壕。

其实苏轼本来与王安石相熟。王安石喜欢字源学，但他的字源学只是关于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喜欢凭空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

苏轼喜欢用反论证法，一天遇到王安石说：“‘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

又一次王安石说“鲵”字从鱼从儿，合当是鱼子，并说四马曰驷，天虫曰蚕，古人制字，定非无义。

苏轼听了拱手进言道：“‘鳩’字九鸟，可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王安石听了，以为真可以增加他的字源说内容，忙向苏轼请教。

苏轼笑道：“《诗》云：鸣鳩在桑，其子七兮。七个小鸟连它娘和它爹，不正好是九个吗？”

王安石自此不喜欢苏轼。

两人的分歧是从政见开始的，苏轼显然是对王安石的变法怀有成见，并认为必须一吐为快，当时他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与行政毫无关系，却两次上书神宗皇帝，并准备罢官而去，时旧党权贵都已去职，形势十分不利，他自己知道，即使不遭大祸，也要被罢免。

但上书之后，竟如石沉大海，不甘寂寞的苏轼再上第三书，对神宗皇帝部分地废止青苗法，引用孟子的话进行攻击：正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从此每月只偷一只鸡。

最终使事情恶化的是《三经新义》，王安石作的《三经新义》对《诗》、《书》、《周礼》重新作了注释，可是这

部在两年之内编写仓促的新作和王安石的字源说一样，充满了新思想，学术根底却糟不可言。可怕的是在王安石当权期间，《三经新义》被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规定科举考生人人必读，考生见解如小有出入，便要落第。并且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新版本就要立即出现。

苏轼见王安石武断至此，十分不平。恰好有机会让他出一道乡试考题，题目是“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代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矛头所向，尽人皆知。

这次惹恼了王安石，他派苏轼去做开封府推官，哪知苏轼死不回头，再次上疏指责新法。王安石一怒之下，遂煽动御吏（监察委员）谢景温告苏轼有罪。众人忙了一番，没有真凭实据，便打发他去做杭州通判（秘书长）。

宋代有读书人少遇的宽松环境，他们不必像唐王朝以前那样对个人言论负完全责任，在此之前的朝代，失实的弹劾或检举，可能被免职或处死，但现在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能遭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是被赶出京，去做地方官。

苏轼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但旧党失势和他不顾形势地顶风而上为后来为他罗织罪名埋下了伏笔，才有了宋代少有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到了杭州的苏轼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快活的日子，那首著名的七言绝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就写于此地。

同时，因游玩寺观，感慨于道士的势力，他还为后人留下了那副有名的对联：

坐请坐请上坐
茶敬茶敬香茶

但是这个喜欢有话就说的苏轼想不到从杭州调密州，从密州调徐州的八年时间里，不知不觉地为自己攒足了麻烦。

在这段浪迹山水的时光里，苏轼留下了几百首诗，并且他还不忘借着吟咏讥讽朝政：

咏青苗：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

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这些诗传诵一时，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苏轼行文轻松自然，但是有了上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下面要写出什么来。以咏盐禁为例，本来是写农民吃竹笋，他却说竹笋好吃，可是没有咸味，因为“尔来三月食无盐”，讥讽官府的专卖食盐。

苏轼的信笔写去，简直是无法节制，他会写农民的儿子把贷款挥霍干净，回家时两手空空，只学到了一口京腔，因为官家很精明，在放款处附近开设了酒馆娱乐场

所。

当这些诗积累成卷时，他的好友、驸马王诜为他印制了诗集。而同时，新党们再也不能容忍苏轼放任下去，决定寻找机会动手。

向来疾恶如仇的苏轼总是直指要害，好在目前为止，尚平安无事，他曾自言“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可是当他吐到第一百次时，被人抓住了。

神宗元丰三年，四十二岁的苏轼调任湖州太守。宋朝的规矩，官吏每到一个新地方任职，都要给皇帝上谢表。

苏轼的谢表本属例行公事，他完全可以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备感皇恩之类。奇怪的是苏轼前两次调职均无异状，惟有此次或许隐忍已久，不得不发。如果他仍旧吟咏那些民间疾苦一类也许敌手会考虑轻重；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的势力下提升起来的李定和舒亶，这些人惟利是图，随风转舵。文中苏轼直言自己天资愚笨不适合潮流，难以追随新进，年纪大了，不能再惹事生非，只能在地方上做做事。

“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里指的是快速升迁的无能之辈，在党派之争中，它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含义，苏轼如此过分，李定和舒亶等人决定出手。

第一个发难的是御史何正臣，他挑出谢表中的四句，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几天后，御史舒亶上书指责苏轼在《山村五绝》等诗中攻击新法，当中有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燕子与蝙蝠的争论，是这样一个寓言，一天，一只燕

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二鸟争持不下，就去请教凤凰。在路上遇见了一只鸟，那只鸟向它们说，好久没有看见凤凰了，有的鸟说它请假不在，有的说它正在睡大觉，现在夜枭正代替它的职位。你们去问它也没有用。

舒亶在上书弹劾的同时，呈上王诜出版的苏轼诗集。

随后，有国子监博士李定之上表弹劾苏轼。

最后出马的就是御史中丞李定，他打出最为沉重的一拳，他陈述了四个理由，认定苏轼必须因其无礼地攻击朝廷而遭斩首，总算报了前仇。

李定因为支持青苗法而受到王安石赏识，其人本为王安石弟子，由秀州判官任上被召入京。从南方来的李定见到王安石就说青苗法在他们那里深得人心，为何京师这里都说行不通？

正在孤军奋战的王安石闻言大喜，立即安排他和神宗皇帝相见，神宗亦是大悦，当下任命李定为知谏院，朝廷大哗，因为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必要资格，纷纷要求神宗收回成命，神宗不得已，只好改为御史。

不久，又有人举报李定在做泾县主簿时，母亲仇氏死了，私自隐瞒不守丧礼，应该治罪贬斥。

父母死了不服丧在当时中国人的伦理中可比为禽兽，非同小可。

李定当然要辩解，但他的理由却十分奇怪。他说自己实在不知道是仇氏所生，所以没有服丧，这李定若是个三两岁的孩子也罢了，问题是他在为官多年，其父李向曾做过国子监博士，却不知生母为谁，谁听了都要愕然。

其实李定是心中不愿认这个娘，原来那仇氏先有前夫，生下一子，成人后就是与苏轼结为至交的佛印禅师。后来仇氏又给李定做妾，才生下李定。此后仇氏又嫁与都氏，生子蔡奴。

一生改嫁两次，这样的妇女在宋代委实不多，不过她先后生的三个儿子都不一般。所以仇氏死去，他心有所忌，不愿服丧。想不到今日关键时刻旧话重提，他只能含糊遮掩，群官哪管这个，只是齐力攻击，李定也觉无趣，只好请求辞职，总算仰仗着王安石，将他改任为中书舍人，去主管中书六房的各项文书和诏命去了。

巧合的是地方官员恰在此时报上来一个寿昌寻母的事迹，尚未平静的朝野又热闹起来。

这个寿昌姓朱，母亲姓刘，在寿昌三岁时，寿昌的父亲就把她赶走了。朱寿昌长大成人后，父亲死了，他大概极为迫切地想知道生母的下落，一直找了很多年。他在当了地方长官后，甚至派部下四处为他找娘，但终无音信，这样一直找到他五十岁。朱寿昌感慨道：“五十岁的人还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忧伤之下，他居然辞官不干了，回到家里说：“我要去找娘，如果找不到，我也就不回来了。”

这个年届半百的朱寿昌一路爬山过水，顶风冒寒，不知道什么叫辛苦，只是一路地细心打听。

这一日走得口渴，恰巧有户人家门前站着个老太太，他走上前去讨水，乘势又寻问起来，那老太太越听心越惊，不待他说完眼泪就下来道：“你就是朱寿昌么？”

母子相见，哭了又笑，笑了又哭，老妇叹道：“我已

七十多岁了，你也五十挂零，谁想到还有母子重逢的日子，必是你至诚动天，才有今日。”

这寿昌寻母传到朝野，百官齐口赞美。若在往日，朝廷必会兴师动众，广播天下，奈何李定之事刚刚了结，竟有这不知时机之事前来凑趣，搞得神宗和王安石极为尴尬。若是表彰寿昌，便是自寻短处，但又不得不有态度，思来想去，下令朱寿昌官复原职，算是了结。

一向喜欢热闹的苏轼那时正在京城供职，岂肯放过这个时机，便写了一首赞美诗送给朱寿昌，并有诗序一篇，诗序里苏轼表面上恭维寿昌，实际在暗骂李定，那李定见了言语不得，心中大恨，遂暗记在心。

今日李定做了御史中丞，乾坤倒转，那苏轼犯在自己手里，岂能罢休。

那神宗一向喜爱苏轼才华，但如今御史台连连弹劾，他也招架不住，不过既然是依法控告，他也愿意充分调查一番。案子就由御史台办理。担任了检察官的李定立即请求将苏轼押解来京，路上苏轼又必须被关入监狱过夜，神宗一听觉得有些过分，坚决不许。

志在必得的李定随后挑拣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太常博士皇甫遵，派他去湖州免去苏轼湖州太守的官职，从速押解来京。

消息很快被驸马王诜得知了，这个苏轼的好友立即派出他的使者去给在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又立即派人赶快去告诉身在湖州的苏轼。

在这个夏天的官道上，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展开了一场使者之间的竞赛，朝廷使者带着两名御史台的兵丁和他

的儿子火速出发，但是他儿子在路上忽然生病，耽误了半天的行程，结果苏辙派来的使者先到一步。

这时的苏轼并不知道大祸正临。他很喜欢湖州这个新环境。当两路使者正赶得浑身冒汗时，苏轼正在院子里晾晒他收集到的名画，他的目光刚好看到画家文与可送他的一幅竹画，不觉流下泪来，这位好友已在几个月前去世了。这天，苏轼怀着忧伤写下了一则关于文与可画竹的笔记。

根据苏轼的朋友孔平仲记载，他是听湖州祖通判所说苏轼遭逮捕时，那位祖通判正好在场——苏轼已经先期得到王诜转来的消息。但他并不知道自己被控罪名的轻重，便和祖通判商量，等使者一到，就由祖通判代行湖州太守职务。

心慌意乱的苏轼尚未安排妥当，皇差便到了。

皇差皇甫遵身披官袍，足登长靴，手执笏板，站在庭院之中，要求苏轼迎接。两名御史台的兵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分立两旁，眼睛里闪动凶光。

太守官衙中的人乱作一团，不知将有怎样的大祸发生。苏轼更不例外，先自乱了手脚。这个潇洒吟唱的诗人从未经历过严酷的政治斗争。他甚至不敢出来与使者相见，六神无主地和祖通判商量怎么办才是。这个祖通判虽然没有上司的高位，但显然是个经历了地方官场倾轧的佼佼者，他看上去很同情这位诗书更长于做官的上司。他首先让苏轼明白了皇差是不可能拒见的，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先要以礼迎接。接下来苏轼又为应当怎样迎

接不知所措，他似乎觉得自己既然被控，就不能穿着官衣去迎接。祖通判又告诉他到现在为止尚未正式被控，只有皇差宣布了才算开始，所以现在应当身穿官衣出去。

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笏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其他人员则头戴小帽，环绕于苏轼身后。

两名兵丁手持御史台公文，气势汹汹的皇甫遵则满脸肃然，默不作声，气氛一时为之凝寂。苏轼事到临头，反而回过神来，首先打破沉默说他知道对皇上犯的错实在太多，也知道此行必死，只是请求念在共同为大宋效力的份上，允许回家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仍旧面无表情：“没那么严重。”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知道了至少不是死到临头。

这时祖通判上前一步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打量一番问：“你是何人？”

祖通判告知他目前以通判代理太守职位。

那持公文士兵这才上前正式递交公文，祖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纸普通公文，责令免去苏轼太守职位，传呼进京。

众人大为松气，连苏轼也觉得自己刚才过于紧张。

皇甫遵要求苏轼立即启程，但允许他出发前，回家道别。

据苏轼本人的笔记记载，他到家时，家人正在大哭，完全恢复了平静的苏轼忍不住又萌发了故态。他笑着向家人讲了一个故事，以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期，皇帝极力在民间访求隐居的高士，有人